

中国共产党

在杞县



中共杞县县委办公室
中共杞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

中国共产党在杞县

中共杞县县委办公室 编
中共杞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在杞县
中共杞县县委办公室 编
中共杞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河南省杞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字数 268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

印刷豫内资料准印通字杞发第 1 号

印数 1—1000 册 工本费：15.50 元

中国共产党在杞县

编 审	孙继书	邢树恩
主 编	郭继成	
编 辑	李继真	孙家平
	杨平钧	张金芹
	何世强	薛红雨

一九九四年五月

编辑说明

为了向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县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县委办公室、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在杞县》一书。

编辑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中央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征集到的大量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求资料翔实,观点正确,再现历史原貌。

全书按历史时期分为八章,主要收录 1925 年至 1990 年中国共产党在杞县的重要活动。对军事、政权、群众组织和其他党派的活动略写或不写。由于《中国共产党河南省杞县组织史资料》已经出版,该书收录的内容,本书一般不再收入。

本书体例突破“史”、“志”传统编排形式。兼收二者优点。锐意作一次编纂地方党史书稿方面的尝试。可否,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评说;行文方法上,以叙述历史事实为主,叙议结合,力求用画龙点睛之笔作以评论。

民主革命时期,杞县是豫东革命根据地中心区,特(地)委等上级党组织多在杞县建立与活动,领导豫东各县的革命斗争,成为杞县党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多数老干部的意见,本书收录了特(地)委的重大活动。

本书正文后附两份资料:

1、地、县委书记简历、照片。只收入县以上党组织一把手。排列顺序先特(地)委,后县委。名录均以任职时间为序。边区县排列为杞南(芝圃)、杞北(克威)、杞通(达生)县。庆华县绝大部分地区在太康,本书未收入。

2、连级以上革命烈士英名录；全县革命烈士达3000多名。他们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篇篇动人的华章。编写此录，让烈士名彪青史，让后人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以激励热爱中华，振兴杞县的积极性。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只录入杞县籍连级以上烈士和领导机关授予荣誉称号的著名烈士。该名录是根据1960年《杞县志》第二卷和1981年杞县人民政府编印的《杞县革命烈士英名录》辑录的。名录排列以姓氏笔划为序。

概 述

杞县位于豫东平原腹地，与兰考、民权、睢县、太康、通许、开封等县为邻，辖 1 镇 19 个乡，552 个行政村，总面积 1218 平方公里，人口 92.3 万人。

杞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五四”运动和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杞县传播。1925 年 8 月，在杞县县城创建中国共产党杞县特别支部干事会，次年 2 月，又扩建为中国共产党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时，建立杞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总团部。1927 年 3 月，根据上级指示，杞县各农民自卫团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河南别动队第二路纵队杞县支队。5 月，杞县支队及通许部分农民自卫军、红枪会武装万余人，在杞县何寨举行暴动，一举攻克杞县城，继而睢县、陈留、永城也被当地农民自卫军攻破。他们严惩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沉重地打击了军阀和地方封建豪绅势力，声势浩大的豫东地区农民暴动，使豫东农民看到自谋解放的曙光。但由于当时中共河南省委执行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加之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相继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镇压，使轰轰烈烈的豫东农民运动遭到失败。中共杞县各级组织被迫于 1929 年春中断活动，革命转入低潮。

1934 年秋，中共地下党员郭晓棠、齐欣、唐汉城等来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 年 9 月，重建中共杞县县委。1938 年 2 月，又扩建为中心县委，负责指导太康、陈留、通许、民权等县的党的工作。6 月初，豫东地区各县相继沦陷。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都加强了对豫东敌后抗战的领导，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到杞县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共豫东特委书记，他领导组建了豫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点燃了豫东敌后抗日烽火，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在艰苦的斗争中，中共党组织

在杞县及其结合部地区逐步发展壮大，除先后建立杞县、杞南县、杞北县、杞通边、杞太边县委及其所辖的几十个区委之外，还先后建立中共睢杞太特委、水东地委、冀鲁豫第十二地委、水东党政军或军政委员会等上级领导机关。到1942年下半年就形成了以睢杞太为中心的水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4年8月，发展为巩固的水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在杞县的各级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带领根据地人民战胜了日、伪、顽、匪的多次进犯和“扫荡”，党组织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仅在杞县就先后牺牲了三位地（特）委书记，1600多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反共，发动内战。处于冀鲁豫和华东两大解放区交通枢纽地带的水东解放区便成了敌人率先进攻的重点。1945年10月，国民党军队便以10倍于人民武装的重兵发动了向水东解放区的进攻。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处境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坚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领导广大军民与敌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配合解放军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和“围剿”，消灭了大量的敌人，保卫了解放区。还利用作战空隙，深入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扩军支前和剿匪反霸斗争，巩固扩大了解放区。1948年7月，睢杞战役胜利结束，杞县全境解放。各级党组织又动员广大青年和民兵参军参战，支援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大西南，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在28年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杞县的各级党组织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机勃勃的一部分。

新中国诞生以后，边区建制各归其位。中共杞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复查、“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消灭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生产力，巩固了人民政权，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

并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1956年，在中共“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共杞县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始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1957年杞县工农业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1957年之后，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等运动中犯了“左”的错误，加之国际风云骤变，国内天灾严重，杞县和全国一样，进入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天灾人祸，中共杞县县委和基层组织，敢于正视困难，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在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杞县人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生产救灾。苦战三年，克服了前进中的困难，使这片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又出现了新的生机。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杞县又成了“重灾区”，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组织瘫痪，党员停止组织生活，不少党的领导干部被批斗，被打成“走资派”。杞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虽然相继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但由于“左”倾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建党”、“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又出现了许多冤假错案，使很多人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打击和迫害。

对于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行径，杞县绝大多数共产党员、人民群众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使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共杞县县委带领全县人民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了他们的帮派体系，整顿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国家机关，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整党等一系列工作，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始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征程，并取得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改革开放使杞县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60多年来，在杞县的各级党的组织，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中，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里程，付出了巨大代价和牺牲，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事实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繁荣昌盛。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杞县各级党的组织一定能够带领全县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把革命老区——杞县建设得更加美好。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	(1)
一、五四运动前后杞县的政治经济状况.....	(1)
二、马克思主义在杞县的早期传播.....	(4)
三、中国共产党杞县地方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8)
四、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	(15)
五、豫东农民武装暴动.....	(23)
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31)
一、中共杞县地方组织的演变.....	(31)
二、共产党人的坚强斗争.....	(32)
三、党在杞县私立大同中学的革命活动.....	(42)
第三章 抗日战争时期	(48)
一、中共杞县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48)
二、中国共产党在杞县境内建立的地级机构.....	(51)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56)
四、组建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	(60)
五、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87)
六、敌伪工作.....	(96)
第四章 解放战争时期	(102)
一、中共杞县地方组织的演变与发展.....	(102)
二、杞县境内地级党的机构.....	(104)
三、保卫水东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	(105)
四、睢杞战役的胜利和杞县全境解放.....	(129)
五、土地制度改革和人民群众的支前工作.....	(133)
第五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144)

一、中共杞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会议	(144)
二、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政治运动	(147)
三、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64)
第六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74)
一、中共杞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74)
二、整风和反右斗争	(176)
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81)
四、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前进	(185)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
一、党组织的恢复和中共杞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
二、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全面内乱	(198)
三、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207)
四、批林整风，纠正极“左”思潮及其反复	(214)
五、下放市民问题	(219)
六、国民经济在困境中缓慢发展	(220)
第八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225)
一、中共杞县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	(225)
二、步履艰难 徘徊前进	(228)
三、拨乱反正及纠正冤假错案	(231)
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235)
五、党的建设工作	(240)
六、统一战线工作	(247)
七、各项改革的全面展开	(250)
附 录：	
一、地、县委书记简历和照片	(255)
二、连级以上革命烈士英名录	(299)
后 记	(333)

第一章 大革命时期

“五四”爱国运动后，杞县一批进步知识青年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组织进步团体，学习探讨革命理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5年2月，马沛毅、张海峰、吴芝圃等一批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杞县建立了中共党、团特别支部，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共青团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杞县农民协会、杞县农民自卫团等党群组织先后建立。中共杞县党组织先后派出党、团员到睢县、淮阳等地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团组织，杞县成了豫东农民运动的策源地。同时，还先后选派党员到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东方大学深造，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1927年5月，为了策应北伐军进军河南，中共杞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了以杞县为中心的豫东农民武装暴动，先后攻占杞县、睢县、永城、通许、陈留等5座县城。杞县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临时治安委员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一、五四运动前后杞县的政治经济状况^①

辛亥革命后，地处中州的河南，一直是军阀混战，兵匪骚扰，民不聊生的混乱局面。位于豫东平原上的杞县，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兵匪之害。当时的杞县是一个政治上反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县。它完全没有近代工业和工业无产阶级，学校教育仅有一所甲种农校和三所高小、一所女小，初级小学也寥寥无几。军阀所委派的

^① 此节根据张海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编写。本文载《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一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官吏和地方上的豪绅、地主把持着县政权，统治着广大农村。帝国主义势力，已深入到城乡。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渐少，外国洋行的经纪人到处去廉价收购农村的烟草、棉花、花生等工业原料，压榨剥削农民。外国传教士，借办学校、开医院等慈善事业之名，为帝国主义搜集情报，进行文化侵略，特别是天主教会庇护教徒、欺压良民、干涉诉讼，最为人民所痛恨。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封建剥削的强度也增加了。地租除继续着中世纪以来的“对分制”和“三七制”^①的残酷剥削外，新的苛捐杂税，也大部分加到农民身上。二十年代初，全县田赋地丁一项就收到 297,000 元（合白银 135,000 两），此外地亩捐每亩地丁 400 文、漕米 100 文，兵差支应局车马费每亩 50 文，随车马往送兵费每亩 30 文，保卫团费每亩 10 文。吴佩孚统治河南期间，还摊派军费借款 50,000 元，富户捐 20,000 元，麻袋捐 8,000 元，粮秣税价征收 50,000 元，金库流通卷硬派 5,000 元，面料柴草费每亩 80 文至 130 文。民国十五年一年内收至三次之多。^② 年利高达三成的高利贷，也只有中农以上的人家才能借到。一般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忍受百分之一百至二百的高利率的借贷。因而农民、手工业工人失业破产到处流亡的情形一年比一年加重。甚至中上层人家，包括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内，也因受到苛捐杂税的剥削和土匪溃兵的骚扰而惶惶不安。这样各界人民都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感到无法继续忍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日益深刻化、尖锐化。

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杞县各阶层政治势力分野，大致可概括为反动、中间、进步的三种势力。

① “对分制”即佃户与地主对收获产品按各百分之五十分配。

“三七制”即佃户与地主对收获产品按佃户百分之三十，地主百分之七十分配。

② 见《河南全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宣言》，载《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二辑。

反动势力：是代表封建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利益的最黑暗、最腐朽、最反动的势力，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基础。在反动势力中，又可分为新旧两派。旧派包括近代一些旧家大族，如侯家、孟家、步家、杜家和近代新起的一些官僚，如胡远灿，田友望，李载赓，侯宜樵等。其中在地方劣迹昭著，最为群众所痛恨的主要有侯五（即侯智斋，国会议员侯宜樵的弟弟）、朱子固（国会议员李载赓的内弟）、段跃斋、孟子义、索汉臣、孟经亭等。这些人虽不是一个什么政治集团，但却代表着各个不同封建帮派的利益，把持着县政府的财政、税务、实业、教育、警察等局和一些乡区政府，直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和压迫人民，甚至包揽词讼，开设赌场，人民称这些人为“本地害”。他们凭着阶级的本能，对共产党一开始就视为洪水猛兽，异常仇恨，企图勾结官府予以扑灭；新派是指坚决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右派，即“西山会议派”。在杞县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薛剑光（广汗）、韦品方（孝儒）、杜襄甫（绪赞）、张子立（学礼）、裴志纯（学俭）、王栗斋等。这一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旧派并无二致，所不同者，是他们还没有在全县范围内占有统治地位，然而他们是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集团，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较旧派更为明确坚定。其骨干分子王栗斋把持着国民党杞县县党部，为其反共反人民的据点；杜襄甫（绪赞），教育系统一霸在杞县甲种农校压迫进步学生；裴志纯任博集镇长，独霸一方，敲诈勒索，鱼肉乡里，其黑暗反动之程度，较旧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间势力——红枪会。杞县红枪会是1920年前后农民为抵御溃兵土匪的抢掠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武装自卫组织。因他们所用的武器长矛上系以红缨而得名红枪会。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

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①，封建迷信色彩很浓。当时已遍及全县农村，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势力。它的组织成份，主要是富农和中农，也包括大多数中、小地主和一部分贫苦农民。但领导权主要在地主富农手里。此外，以宗教为职业的师父，对红枪会群众也有很大影响。红枪会本是农民为抵御溃兵土匪抢掠的自卫组织，但发展成群众性组织，有了充分的抵御溃兵土匪的力量之后，群众和封建统治势力的矛盾就渐渐显示出来，要求反对苛捐杂税、贪官土劣。杞县西南部蔡堌一带红枪会曾把县知事杨孝英率领的县警备队打个落花流水，杨孝英弃轿狼狈而逃。在全国革命形势与红枪会内部反封建的群众性斗争日益发展的情形下，红枪会的领导成份及其组织也发生激烈的分化。一部分较开明的进步分子顺应群众的要求日益倾向革命；另一方面，豪绅地主、地痞流氓也积极把持红枪会，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不惜与军阀官府同流合污，与人民对抗。红枪会组织成为反动与革命双方争夺的势力。

进步势力：主要指贫雇农、店员和手工业者以及先进知识分子等基本群众。他们虽然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并且也曾参加过一些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但是到党的组织成立以前，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如当时商人有商会组织，手工业的业主有公会组织。但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却完全没有工会组织。农村的贫雇农就更没有自己的组织了。中小学教师、学生等下层知识分子，虽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的组织，但他们既没有党的领导，又缺乏和工农群众的联系，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这些进步势力极待党领导他们发展革命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开展革命活动，打击与推翻反动势力的统治。

二、马克思主义在杞县的早期传播

^① 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纪检会》。见《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一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杞县。杞县甲种农校、杞县第一高等小学和五门国民小学等广大师生奋起响应。他们组织杞县学生联合会，印发宣言、传单，召开各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查抄焚烧日货，“打倒卖国贼”，“打倒帝国主义！誓死收回青岛主权”等口号震撼古城，掀起了杞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使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地变化，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斗争，转向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革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使中国革命面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影响和改变着杞县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和政治状况。许多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步知识分子孟墅垣（昭朴）、孟新垣（昭渠）兄弟积极支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欲从教育后一代青年中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便在杞县黉学内开设一座私塾，陆续接收一些中小学和私塾学生。先后在这里就读并有进步倾向的有马沛毅（培义、宜轩）、杜孟模（宏远）、马培源（培元、源泉）、何心桐（心启、峰山）、张海峰（萃中、勃）、高炳垣（光履）、韩绍棠（达生）、吴殿祥（芝圃）、靳予九（锡龄）等十多人。孟墅垣讲授古文、四书和宋明理学家的道德学说；孟新垣向学生讲法制、经济（当时的中学教科书），并向学生介绍梁启超的德育鉴和饮冰室文集及一些新的报章杂志，提倡写白话文，开拓学生眼界。这些年轻学生，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感召下，又得到老师的 support，很快产生了进步要求。他们开始不满现状，鄙视旧的传统，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旧礼教，反对文言文，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充满厌恶和憎恨；他们拥护真理，拥护科学与民主，希望有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和平、统一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不怕社会舆论的攻击、非难，不怕与社会完全决裂，公然向它宣战。